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研究：近期回顧與未來展望

陳雲云*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深刻地回答了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該思想的形成發展、基本內涵、鮮明特徵、內在邏輯、現實啟示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和探討。梳理、歸納和簡評其中的主要觀點，並且提出研究展望，以期對今後深化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

釐清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的基礎和條件，是該課題研究的邏輯起點。綜觀現有成果，研究者們一致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國際與國內、理論與實踐、歷史與邏輯、內因與外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優良的理論品質、深邃的思想內涵源於國內外環境的應激要求、中共執政經驗的積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澱及獨特的個人風格。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應該從國際和國內兩方面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的時代環境。改革開放的複雜形勢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發軔最大的時代背景。李君如指出，該思想不僅是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提出的時代課題，而且也是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提出的時代課題，更是信息化迅猛發展過程中提出的時代課題。¹ 韓慶祥從大歷史的視野將當前所

處階段的特徵概括為“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克難—治理現代—建構秩序”，認為十八大以後中國真正進入了“發展起來以後”的歷史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也進入了表達訴求期，民眾的利益訴求在增強。² 丁威、陳劍用辯證的眼光分析了習近平在治國理政過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即幹部不正之“四風”、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社會矛盾凸顯、改革積累問題龐雜、利益格局調整艱難等，阻礙着改革發展的進程。³ 劉剛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形成發展面臨的形勢概括為：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但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在頂層設計的指引下穩步展開，但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仍顯不足；三是法治建設和黨自身建設取得新突破，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任重而道遠。⁴

當今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意味着中國已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目標，已初步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面臨的最大“世情”。韓慶祥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遭遇”的國際因素概括為：民族復興—力量博弈—圍堵打壓。⁵ 李玉貴、李婧重點論析了國際環境給習近平治國理政帶來之“危”，即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生態危機、恐怖主義、核危機等國際性問題，客觀地要求中國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加強國際合作，承擔大國責任。⁶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淵源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

* 南京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

物，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

宇文利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現時代的具體運用和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是別而恰恰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思想材料”和最直接的思想來源。⁷ 孫景民撰文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源頭，認為該思想有四個方面的來源：一是科學社會主義中關於歷史發展規律的思想；二是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三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思想；四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方法。⁸

習近平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對傳統哲理、詩詞歌賦、群眾語言運用自如，並且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注重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習、運用和推廣。有學者認為，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思想滋養。唐寧、蕭寒認為，習近平熱衷於傳統文化，高度認同傳統文化，喜歡閱讀傳統文化典籍，因此在其治國理政思想發軔過程中，必定會吸取其精華。⁹ 戴連渠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吸收和運用體現在：一是熟用傳統經典哲理；二是巧用傳統詩詞歌賦；三是妙用傳統群眾語言；四是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¹⁰ 也有學者提及，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對中華歷史文化和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積極弘揚和借鑒。¹¹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實踐基礎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關懷。唐寧、蕭寒強調，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實踐經驗和教訓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借鑒。¹² 韓慶祥提出比較有新意的觀點，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產生出來的，是從對“中國問題”的解答中產生出來的，是書寫當代中國發展“現實邏輯”的典型範例。¹³

習近平長期扎根基層，急人民之急，念人民之苦，從而培養了其深厚的人民情懷。有學者重點研究了習近平個人的實踐經歷、人生閱歷與其治國理政思想生成之間的內在勾連。唐寧、蕭寒認為，習近平與基層幹部群眾的深情厚誼是其治國理政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邏輯起點；豐富的從政閱歷和施政實踐錘煉了

其治國理政科學的思維方式；家教甚嚴的家庭環境對其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¹⁴ 李玉貴、李婧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認為，習近平成長與從政經歷有三個情結，即“紅色情結、知青情結和基層情結”，這對其治國理政思想形成起到積極作用。¹⁵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

用“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來概括和表述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成果，是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進一步深化和提升，這種表述會更全面、更準確、更科學、更規範，更符合實際和實踐走向，更易於國際社會對話交流。釐清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科學內涵，是該課題研究的首要問題，也是研究者重點著墨之處。

“一維說”。學界對於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基本內涵的探討主要集中於治黨與治國，側重於內政層面。有學者側重從某個方面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展開研究。制度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靈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具有統領性和指導性，這種制度治理正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特質。宇文利認為，健全和完善制度、保持制度自信、嚴格制度執行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關於制度治理的主要內容。¹⁶ 賈月成提出新穎觀點，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習近平對“中國走甚麼路、向何處去”這個帶有方向性、戰略性問題旗幟鮮明的回答，是實現中國夢之學說，是其治國理政思想之核心。¹⁷ 也有學者結合“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五大發展理念”來闡述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豐富內涵。例如，王鈺鑫認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科學地回答了黨治國理政中方向與路徑、目標與舉措、全域與重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關係¹⁸；黃書進則認為，“五大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¹⁹

“四維說”。吳傳毅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框架與核心內容歸納為“四個一”，即一條主綫：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目標：為中國夢

而奮鬥；一個中心：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個動力：全面深化改革。²⁰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內涵豐富、思維創新、思路清晰、科學嚴謹，體現了習近平高屋建瓴的戰略眼光和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彭麗花也將該思想概括為四個“一”，但與上述所論略有差異，即一個主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一條主綫——推動科學發展不停頓；一個環境——內政外交互動建立法治中國和國際新秩序不鬆懈；一個保障——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不含糊。²¹ 蔡開明從習近平講話的文本出發，認為應從四個維度對其治國理政思想進行綜合解讀：一是反思歷史：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新內涵，為治國理政提供基本遵循；二是謀劃未來：提出並系統闡述中國夢，為治國理政確立奮鬥目標；三是立足現實：提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形成治國理政總方略；四是面向全球：適應形勢新變化，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²² 陳步偉認為，求真務實的基本原則、辯證思維的運思模式、系統實踐的重要環節以及人民導向的價值遵循，構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內容和內在邏輯。²³

“多維說”。大部分學者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多種視角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進行挖掘。李君如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一個有着豐富思想內涵和內在邏輯的科學體系，包括國家發展的根本方向、奮鬥目標、發展動力、工作中心和總佈局、國防和祖國統一、外交、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主要內容。²⁴ 有學者將該思想形象化地表述為：“夢”論——民族復興；“鞋”論——中國道路；“啃”論——改革開放；“鐵”論——黨的建設；“籠”論——反腐倡廉；“鈣”論——理想信念。²⁵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還涵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歷史任務、核心本質、發展階段、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展戰略、依靠力量、國際關係、領導核心和根本保證等內容。余雙好強調，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主要包括“五用”，即用中國夢描繪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追求，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築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當代中國人的精神

力量。²⁶ 韓慶祥認為應該從十大方面去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和自信思想；二是實現中國夢思想；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四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思想；五是市場與政府關係思想；六是“打鐵還需自身硬”思想；七是全面依法治國思想；八是文化軟實力與意識形態話語權思想；九是進行偉大鬥爭思想；十是分析解決問題的哲學方法論。²⁷ 韓振峰不僅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內容，而且進一步闡述了該思想的內在邏輯。認為該思想包含的“一條主綫”、“兩個百年目標”、“三個價值引領”、“‘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五大發展理念”，五個方面一環套一環、一扣連一扣。²⁸

以上觀點的差異是建立在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內涵的不同理解基礎之上，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實現中國夢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為根本旨歸。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

研究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對於凝聚改革共識，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實質，具有重要意義。學界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徵的看法眾說紛紜，主要觀點如下：

一是“問題導向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所要回答的“時代性課題”是：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中實現甚麼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如何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前者是治國理政的目標問題，後者是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總體方略和行動綱領。同時，面臨的根本問題主要有兩類：一是過去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的問題，主要是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二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關注並致力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問題。因此，有學者提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在於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²⁹

二是“價值目標說”。宋福范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從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性質出發，從價值目標和實踐目標兩個角度闡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目

標，形成了鮮明特點：一是明確強調“為了誰”的價值目標；二是明確將“幹成甚麼樣”的實踐目標定位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³⁰不少學者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歸納為“人民性”。筆者認為，該思想凝聚了民心、匯集了民智、維護了民利，是堅持真理標準與價值尺度相統一的典範；實現人民利益，既是中國共產黨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堅決的責任擔當，也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³¹

三是“四特徵說”。宇文利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徵概括為“四性”：一是全面而齊整，具有綜合性；二是堅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路線的正確性；三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執信與篤行，具有信念的堅定性；四是源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最終還要指導實踐，具有理論的指導性。³²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來源與內涵，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特徵。熊傑將該思想的特點概括為：一是以民本思維心繫人民利益，始終將以民為本理念貫穿於治國理政的全程，始終把人民利益作為執政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以實踐思維解決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三是以戰略思維謀劃社會發展的全域，從整體上思考中國的現在和未來；四是以系統思維協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在整體的前提下研究解決局部問題。³³鄒安樂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點體現在：一是戰略取向上的人民性，即堅持把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最高標準；二是戰略目標上的發展性，即對民族利益有着清醒的認識；三是戰略道路上的堅定性，即對中國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改革路徑等重大問題作了新的闡釋；四是戰略方法上的科學性，即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探索治國理政的新方略。³⁴

李君如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地闡述，認為該思想具有八個顯著特點：一是以人民為主體；二是實幹興邦；三是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相協調；四是經濟新常態和創新驅動相互促進；五是制度現代化和人的能力現代化相結合；六是治國、治黨、治軍相輔相成；七是在優秀傳統文化和現代化思想相融合中培育全社會核心價值觀；八是剛柔相濟參與全球治理。³⁵此外，涂小雨從群眾路線的角度論述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點：一是相信群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本色；二是依靠群眾，進行具有許

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門爭；三是發動群眾，着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建構，把群眾路線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綫索和抓手。³⁶也有學者從習近平的獨特氣質和特殊經歷入手，認為他的政治氣質使其治國理政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格力量，直面問題、勇於擔當則賦予該思想求真務實的風格。³⁷

四、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係

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辯證思維、歷史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和底綫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學界重點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之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和方法論問題。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思維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王立民指出，該思想閃爍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的光輝，即體現了戰略與境界、膽識與胸襟、視野與策略、智慧與情懷的辯證統一。³⁸有學者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的哲學思維概括為“戰略辯證法”，並認為該思想運用了歷史思維重邏輯和必然、辯證思維重本質和規律、戰略思維重全域和長遠、創新思維重大勢和變革、底綫思維重主動和應對這五大哲學思維。³⁹朱書剛將該思想的思維特點概括為：以“民本思維”定目標；以“實踐思維”探路徑；以“戰略思維”謀大局；以“創新思維”增活力；以“底綫思維”防風險；以“法治思維”求善治。⁴⁰習近平的系列重要講話，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現了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和系統思維，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指明了方向。⁴¹陶文昭重點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歷史思維，認為習近平在闡發中國夢、中國道路、國家治理、核心價值觀、和平發展等重大戰略時都融入了歷史思維，並且要求黨員幹部學習歷史，培育歷史思維，科學地運用歷史思維。⁴²

(二)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方法論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注重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將哲學方法論靈活運用於治國理政實踐中，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時俱進的優秀品格，而且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善於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問題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鮮明特徵。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用發展的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用系統思維和整體思維推進改革開放，用兩點論觀察和處理問題，體現了對辯證法的靈活運用。⁴³ 黃書進在《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文中認為，真摯為民的執政情懷、志存高遠的堅定信念、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不負重託的使命擔當、統攬全域的戰略智慧，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映出其治國理政的根本立場、奮鬥目標、思想路綫、精神動力和科學方法。⁴⁴ 陶文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視角出發，分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之中蘊含的方法論：一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域，善於把握事物發展總趨勢和方向；二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善於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三是從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及系統與環境的相互聯繫、作用中把握社會發展；四是破除迷信、超越過時的陳規，善於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五是以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估計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防患於未然。⁴⁵ 習近平從哲學的高度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宣導全黨認真學習、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自覺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實際問題。秦繼茂明確指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蘊含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既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特色，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光輝典範。具體而言：一是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蘊涵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精髓；三是堅持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相統一，對唯物辯證法靈活運用；四是堅持尊重人民主體性與實現人民利益相統一，豐富了唯物史觀的內涵。⁴⁶

五、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價值認定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了新活力，為中國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也為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方向引導。研究者們主要從理論和現實兩個維度闡釋了該思想的價值。

(一)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價值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彰顯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實踐基礎上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詮釋了黨追求共產主義理想與社會主義實踐的高度統一。許多學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貢獻。其中嚴書翰認為，該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在三個層面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深刻揭示；二是提出並回答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課題；三是高揚以人為本理念，重視並切實加強民生建設。⁴⁷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脈絡上的延續。孫景民認為，該思想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揭示了當代中國的發展走向，為黨在更高層次上認識社會主義，開闢一條發展更好、人民享受成果更多、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思想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科學社會主義歷史規律思想起點依據學說、思想形式內容學說在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中的具體體現，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深刻詮釋。⁴⁸

(二)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現實意義

理論的目的和價值在於指導實踐。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不僅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而且必將對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進步事業產生深遠影響。諸多學者深入研究了該思想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及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價值。

其中熊傑指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實現中國夢的行動指南，是凝聚力量、攻堅克難的思想武器，

是建立合作共贏國際關係的助推器。⁴⁹ 馬向榮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涉及的範圍已由“點面”突破創新到“全方位、配套性”階段；涉及的層次由“經驗性、實驗性、零散性”摸索突破創新到模式“頂層設計性”階段；涉及的分配格局與規則已由“動新增”突破創新到“清特權”階段；涉及的領域與方式已由“社會改革先行”突破創新到“政府改革與社會改革同步推進”階段；涉及的對外政策與國家形象已由“韜光養晦”突破創新到“自信有為、主動擔當”階段。⁵⁰ 孫景民研究強調，該思想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作為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擺在突出位置，中國將義不容辭地以大國形象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發展的中國必將給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福祉。⁵¹

六、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拓展性研究

習近平多次巧妙地引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名句、歷史典故，表達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思路，闡述大國外交新思維，升華講話內涵與時代精神，新人耳目，振奮精神，成為古為今用的典範。⁵² 傳統文化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發端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諸多學者探究了兩者的內在關係。如劉東超認為，習近平全面深入地闡述了傳統文化在其治國理政中的資源意義：一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及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中，強調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二是在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中，注重借鑒傳統文化的積極精神和歷史經驗；三是在對外交往中，注重運用傳統文化的智慧；四是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中，強調借鑒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⁵³

此外，孔根紅研究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外傳播問題，認為要實現政治話語傳播的戰略轉型，破除當前流行的唐吉訶德式、自娛自樂式、零和博弈式、政治口號式、旁徵博引式的傳播方式，宣導林語堂式(經典散文)、愛德格·斯諾式(中國故事)和戴秉國式(辯論式)傳播方式。⁵⁴ 葉自成、李定華也認為，應該借助政府外交場合、官方對外平台和公共外交渠道加強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對外傳播。⁵⁵ 劉希良研究了習

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群眾路綫的內在勾連問題，認為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這種統一既體現在其執政理論的創新方面，也體現在執政實踐的開拓之中。⁵⁶ 王喜成則研究了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關係。⁵⁷ 陳蘭芝還研究了如何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論課教學的實踐理路。⁵⁸

七、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研究展望

學界已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內涵、特徵、價值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不僅深化了對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研究，而且也為該課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毋庸諱言，當前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這正是今後研究亟需注意和加強的。

第一，有些觀點和提法需進一步商榷。比如，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作為一個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其理論分量可以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提並論。筆者認為，一方面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雖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但是目前仍處於理論闡釋階段，還在實踐之中，其理論體系尚未構建；另一方面這涉及到對該思想的科學定位問題，屬於黨和國家的重大理論問題，需慎重待之。

第二，研究領域和視域需進一步拓展。從近期研究成果來看，一是側重單一層面、單一學科和定性研究的成果較多，還鮮見有從多維視角、多學科融入、定量分析的成果問世；二是宣傳性、闡釋性的研究成果較多，系統性、學理性的成果相對較少。因此，一方面應加強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整體性研究和多學科綜合探究，另一方面應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國際關係等角度進行跨學科研究。同時，還應加強對該課題的域外研究，增強學術研究的國際話語權。雖然目前已有研究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研究，但是無論是從文獻量還是研究的側重點來看，研究力度還有待加強。

第三，研究方法和範式需進一步創新。現有研究大多致力於從宏觀層面對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進行

理論闡釋，鮮有從微觀角度運用比較研究、計量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問世。因此，一方面需加強比較研究，特別是應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置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宏大視野之中，比較其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治國理政思想之間的繼發關係；另一方面鼓勵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對該課題進行交叉研究，並有意識地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建立全方位、多層面的研究方法體系。

第四，研究思維和理念需進一步更新。綜觀已有研究成果，研究視野還不夠開闊，選題也比較集中。如關於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涵、特徵、意義等問題，研究成果已蔚為壯觀，但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不少論著從內容到風格都如出一轍，基礎性和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偏少。

在未來研究中，只有積極拓寬研究視界，善用歷史思維、世界眼光，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地深入推進，才能避免雷同，湧現出更多兼具理論深度和現實價值的精品力作。

註釋：

- ¹ 李君如：《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顯著特點》，載於《北京日報》，2016年1月18日，第13版。
- ² 韓慶祥：《論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載於《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1期，第4-14頁。
- ³ 丁威、陳劍：《基於大國視角的中國治理問題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價值示範》，載於《寧夏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第4-9頁。
- ⁴ 劉剛：《試論習近平“四個全面”治國理政思想及其重要意義》，載於《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15-19頁。
- ⁵ 韓慶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學習習近平治國理政論述》，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5月27日，第13版。
- ⁶ 李玉貴、李婧：《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探析》，載於《理論研究》，2015年第5期，第39-46頁。
- ⁷ 宇文利：《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品質》，載於《人民論壇》，2015年第6期，第23-25頁。
- ⁸ 孫景民：《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探析》，載於《人民論壇》，2014年第32期，第194-198頁。
- ⁹ 唐寧、蕭寒：《習近平治國理政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思想淵源》，載於《學術論壇》，2015年第10期，第47-50頁。
- ¹⁰ 戴連渠：《習近平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載於《達州新論》，2015年第2期，第11-13頁。
- ¹¹ 李洪峰：《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10月26日，第1版。
- ¹² 同註9。
- ¹³ 韓慶祥：《現實邏輯——中國問題——治國理政》，載於《學習時報》，2015年9月7日，第3版。
- ¹⁴ 同註9。
- ¹⁵ 同註6。
- ¹⁶ 宇文利：《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治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總體特色》，載於《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62-66頁。
- ¹⁷ 賈月成：《全面深化改革學說：習近平治國理政之核心》，載於《毛澤東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第18-23頁。
- ¹⁸ 王鈺鑫：《“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內在邏輯的再認識》，載於《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第17-22頁。
- ¹⁹ 黃書進：《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載於《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2期，第10-16頁。

- 20 吳傳毅：《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基本框架與核心思想》，載於《求索》，2014年第9期，第4-8頁。
- 21 彭麗花：《淺析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觀》，載於《學術評論》，2014年第5期，第68-74頁。
- 22 蔡開明：《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四維解讀》，載於《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93-100頁。
- 23 陳步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內在邏輯》，載於《寧夏黨校學報》，2015年第6期，第9-13頁。
- 24 同註1。
- 25 康偉：《習近平治國理政戰略思想的六個形象化表達——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梳理》，載於《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第31-36頁。
- 26 余雙好：《用新理念凝心聚力，以新思想引領時代——習近平治國理政新思想研究》，載於《黨建》，2016年第2期，第14-15頁。
- 27 韓慶祥：《全面深入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十個重要方面》，載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6期，第24-28頁。
- 28 韓振峰：《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內在邏輯》，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12月7日，第16版。
- 29 同註5。
- 30 宋福范：《習近平思考治國理政目標的鮮明特點》，載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6期，第28-30頁。
- 31 陳雲云：《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價值旨歸》，載於《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第19-23頁。
- 32 同註7。
- 33 熊傑：《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點及意義》，載於《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第45-48頁。
- 34 鄒安樂：《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戰略思維的主要特徵》，載於《軍隊政工理論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15頁。
- 35 同註1。
- 36 涂小雨：《從群眾路線論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特點》，載於《桂海論叢》，2014年第3期，第72-75頁。
- 37 同註6。
- 38 王立民：《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哲學思想》，載於《世界哲學》，2016年第1期，第5-28頁。
- 39 韓慶祥：《治國理政需方法——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哲學方法論》，載於《求是》，2015年第5期，第17-20頁。
- 40 朱書剛：《習近平治國理政方法的思維特點》，載於《長江日報》，2015年2月13日，第7版。
- 41 張碩、高九江：《習近平治國理政大思維解析》，載於《大連幹部學刊》，2015年第11期，第28-30頁。
- 42 陶文昭：《治國理政的歷史思維》，載於《科學社會主義》，2015年第3期，第72-76頁。
- 43 樓陽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重要思想要把握好“六個重點”》，載於《黨政幹部論壇》，2014年第1期，第4-7頁。
- 44 黃書進：《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載於《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35-46頁。
- 45 陶文昭：《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科學思維》，載於《理論探索》，2015年第4期，第5-11頁。
- 46 秦繼茂：《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意蘊》，載於《學習與實踐》，2015年第9期，第5-10頁。
- 47 嚴書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學習習近平治國理政論述》，載於《經濟日報》，2015年11月26日，第14版。
- 48 同註8。
- 49 同註33。
- 50 馬向榮：《脈絡品質境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應明確的三個要點》，載於《發展》，2015年第8期，第10-11頁。

- ⁵¹ 同註 8。
- ⁵² 張蘭：《妙用經典賦新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所用古典詩文論析》，載於《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第 116-119 頁。
- ⁵³ 劉東超：《優秀傳統文化為治國理政提供豐厚思想營養》，載於《學習月刊》，2014 年第 19 期，第 21-22 頁。
- ⁵⁴ 孔根紅：《關於對外傳播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新理念的幾點思考》，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70-74 頁。
- ⁵⁵ 葉自成、李定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及其國際傳播路徑初探》，載於《對外傳播》，2016 年第 3 期，第 10-12 頁。
- ⁵⁶ 劉希良：《習近平治國理政與創新發展群眾路綫》，載於《桂海論叢》，2015 年第 5 期，第 93-96 頁。
- ⁵⁷ 王喜成：《突出頂層設計 凸顯治國理政新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體會》，載於《領導科學》，2015 年第 33 期，第 4-5 頁。
- ⁵⁸ 陳蘭芝：《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融入“概論課”教學的實踐理路》，載於《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16 年第 1 期，第 75-78 頁。